

丝印考察中的几个问题

——勘合功能与造型表现

[日] 刘作胜

内容提要：有关丝印的研究，其功能之说诸说纷纭，笔者依据新发现的资料，尝试以明代中日海上贸易为背景来考察丝印的各项功能。后半部对丝印的造型特点分类分析，并对其在日本影响作以论述。

关键词：勘合贸易 丝印功能 造型分析 对日本影响

有关丝印的研究，《西泠印社》第11辑（2010年）曾出版过《丝印研究专辑》，为丝印研究开启了先端，提供了宝贵的资料。由于丝印大多存留于日本，相关的研究日本方面先行展开，但以零星片段居多，论述仍然不详。今不嫌庸昧，依据新发现的资料，将考察中所得赘述如下，以供研究。

一、丝印的产生

丝印之制，起于何年代无从详考，其用途之迷至今诸说纷纭，笔者试从明日（明朝与日本）海上贸易背景中来逐步分析，从而探求它的历史功能。

明日贸易的一个重要特征是“勘合贸易”。何为勘合？宋·叶适《经总制钱一》中称：“得产有勘合，典卖有牙契。”作为动词来说即勘验、勘证，作为名词来说勘合是一种印信。古时符契文书上盖印信，分为两半，当事双方各执一半，用时将二符契相并验对骑缝印信作为凭证，同时也可以指勘合文书时所用的符印。笔者认为明日贸易中的“勘合贸易”可分为官、私两种等级，官是指朝贡贸易，私是指走私贸易。由于国策、地域（隔海）、语言、隐私等诸多因素的影响，双方或多方交易过程中需要有多重的勘合环节，故而印鉴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，这是丝印产生的历史背景。

先说官用。明初，朱元璋为巩固封权，抵制外扰，实行“片板不得入海”的禁海政策，严禁沿海出海贸易，自洪武四年（1371）首度颁布海禁起，只允许外国与明朝进行有时间、地点规定的朝贡贸易。明成祖时，为了防止伪诈，贡船需持有明朝事先所颁“勘合”（执照签证），规定凡至中国使者，必验勘合相同，否则以假冒逮之。永乐年间，明朝发给日本勘合达百道之多，作为日本使船来华贸易的凭证。官方勘合贸易其始于洪武十六年（1383），终于嘉靖二十八年（1549），历时166年。



图1 《戊子入明记》手绘勘合符样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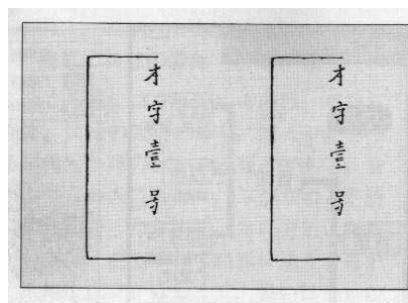


图2 勘合符样式

勘合的实物已经看不到，京都的临济宗妙智院藏有1498年遣明僧天与清启（生卒年不详）的渡明记录文集《戊子入明记》。天与清启曾经随贡船两度入明，在《戊子入明记》中有其手绘的勘合样式。（图1、图2）

左页：

此勘合百枚内

六枚普广院殿御代永享四年渡唐之

十枚天龙寺船时渡唐之内

一枚志摩津方依不渡船留之

已上拾陆枚

残八十四枚宽正柒年渡唐之时还大明国

右页：

勘合料纸印形、样式

民国颁赐日本的勘合百道，系由日字号勘合100道和本字号勘合100道，以及日字号勘合底簿2册和本字号勘合底簿2册组成。皆中缝割开，左半部为符，右半部为底簿。日字号勘合100道、日字号与本字号勘合底簿各一册存于明朝礼部；本字号底簿一册置于福建布政司；而本字号勘合100道、日字号勘合底簿一册则送至日本。日本入明朝贡的船只，每船需带勘合一道，与宁波布政司存放的底簿核对无误后，始护送至京，再与置于礼部的底簿核对。由明朝派往日本的船只，亦需带礼部的日字号勘合，与日本的日字号勘合底簿核对无误后，才准予入口贸易。每逢朝廷改元时，即将新勘合和底簿送到日本，把未用完的旧勘合和底簿收回。据说终明之世，共颁赐给日本的勘合有永乐、宣德、景泰、成化、弘治、正德六种。

勘合符上有无印章，图中未得见，但是文献记载中是有的。

明唐顺之《条陈海防经略事疏》：“臣又据总兵官卢鏜手本……与日本金印勘合。”^①

田中健夫《勘合符·勘合印·勘合贸易》：“勘合符有勘合印。”^②

《明史纪事本末》第五十五卷记载：“成祖永乐元年，日本王源道义遣使人贡，赐冠服文绮，

① （明）唐顺之：《荆川先生文集》，卷十三，商务印书馆《四部丛刊初编》本1936年版，第17页。

② [日]田中健夫：《日本历史》392号，吉川弘文馆1981年版，第765页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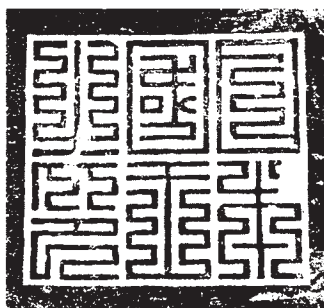


图3 明成祖所赐“日本国王之印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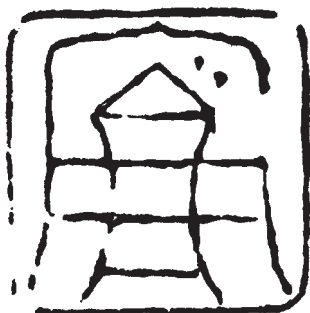


图5 吉川灵华用系印印影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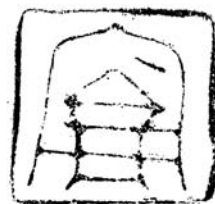


图4 宗像大社神宝馆藏“勘合印”
长3.3厘米，宽3.2厘米，高3.1厘米

给金印。”

与其相符的日方文献中记载：“永乐帝继位甫，受篡夺者之谤，喜外夷使节到来以证其德，赐（足利）义满‘日本国王之印’（图3）与通交必要之勘合符。”^①

勘合符所捺之印是否为明成祖所赐“日本国王之印”金印？天与清启所绘勘合中未见明廷之印，出于对等，日方亦不会用国王金印。勘合印的样式文献没有记载，笔者在调查中发现福冈县宗像大社神宝馆藏有一枚“勘合印”（图4）。

宗像大社自古以来就是海上交通安全护佑神社，明日贸易的门户博多港就在其附近，被称为“海上正仓院”冲之岛藏品也收藏于其中，所以此处发现勘合印是合乎其历史的。对于此印的说明是“幕府于勘合符上捺勘合印交付遣明船，以此与明侧本字底簿照合”，印文似字非字不可辨识。

明国发出禁海令后，冒充日本贡船于明国沿海或上陆贸易的现象时有发生，伪造勘合符从技术上来说并不难，有难度的是印章。可以设想，明晰可辨的印文往往容易伪造，而暧昧难辨的印文反而不易模仿，这一点有些类似于花押比签名难仿的原理，印文中隐藏的特定记号外人不易破解，此种样式更宜防伪。宗像大社所藏“勘合印”与丝印“似文而非文，或有一字可读而他不可识”的特征相符，并且外观风格、材质大小与丝印高度相似。

江户时代《筑前国续风土记拾遗》记载：“享和元年（1801）辛酉六月十二日得铜印一颗，难冠钮、书体古雅，爱其古色，与宗像社所藏勘合印同样。”按，“难”与“鸡”二字古体字形相

① [日]佐久间重男：《勘合制度》，《对外关系史辞典》，吉川弘文馆2009年版，第280页。

似，故疑“难”冠钮为鸡冠钮。^①由此可知，勘合印的名称并非后人所杜撰，此印早在江户时代就已经以“勘合印”而存在。

无独有偶，《聚类书画落款印谱》^②中，画家吉川灵华（1875—1929）所用的一方丝印（图5）与此“勘合印”图文几乎一致。吉川灵华是“狩野画派”的传人，江户时代“狩野画派”的狩野探幽（1602—1674）喜好丝印，从继承的角度来看，吉川灵华使用丝印也是有来源的。问题是宗像大社的“勘合印”与吉川灵华的丝印图文一致的话，丝印中也包括了当年官用的“勘合印”？

那么，勘合印与丝印的区别在哪里？首先有必要了解一下丝印名称的由来。收集丝印的第一本印谱《古铜印汇》是日本明和三年（1766）集安田箕山藏品，由篆刻家高芙蓉（1722—1784）校定辑成，高芙蓉所写序文中无丝印的名称。丝印的第二本印谱于安永二年（1773）辑成，也是由高芙蓉推荐，集菊池宗雨藏品的《古铸百印》，也不见丝印的名称。这说明，在江户时代末期，丝印被很概括地称为“古铜印”或“古铸印”中的一种，并没有专用的名词。丝印一名，最初来自于日本明治三十八年（1905），横井时冬（1860—1906）在《考古学杂志》发表的《丝印之考》：“至足利氏，天下如麻之乱，农民操戈从军，养蚕之道衰竭，不能满足需求，故明德应永年代织物原料生丝逐渐仰仗明船输入，当时彼邦输入生丝一斤必配铸印一个，以为合同之证，称此铜印为丝印。”^③

因此可以说，丝印名称出现得很晚，早在江户时代明日贸易的门户博多港、宗像大社地区被称为勘合印，这是出于对其勘验船舶身份功能而付的称呼。

上述为官用勘合之说，以下再说一下私用。

日益增长的海外贸易需求，导致在正常的贡船贸易之外，早已存在走私贸易的民间渠道。虽然持有勘合的国家可享有贸易上的种种特殊权益，但究为贡约所限，不能随其所欲往返。同时此仅为贡船国家王室或支持下的贸易，一般番商因不能取得勘合，便无法进口。而贡船输入货物，又为所垄断，于是贡使、中外商人，遂互相窝藏接引，进行秘密私贩活动。尤其中国海商，在禁海垄断、外舶独占的双重刺激下，既不能取得公平的贸易，便只有越关冒禁，挑战下海，从事非法贸易了。嘉靖二十八年（1549）以后，宁波酿成了拼杀事件——“争贡之役”^④。此后，明政府断绝勘合贸易，转而对日厉行海禁，较之明前期，来了个180度大转弯，且终明之世，两国未再恢复正常的贸易关系。明朝对日政策由局部开放变成完全封闭，结果欲速则不达，反而产生了新的问题。中日贸易实际需求与勘合贸易方式制约之间的矛盾更为突出，海上走私贸易疯狂已经成为历史的必然。

明日海上贸易中，生丝占有的比例最大。（图6）《大乘院寺社杂事记》：“唐船之理（利）

① [日]花田胜广：《宗像地域の古代史と遗迹概説》，むなかた电子博物馆纪要，第2号，2010年4月1日。

② 第一书房，昭和四十八年发行，第280页。

③ [日]横井时冬：《丝印之考》，《考古学杂志》第八号，明治三十八年（1905），第337页。

④ “争贡之役”：嘉靖二年（1523）六月，日本左京兆大夫内艺兴遣使宗设抵宁波；未几，右京兆大夫高贡遣使瑞佐偕宁波人宋素卿亦至。由于宋素卿贿赂宁波市舶太监赖恩，宴会时得以坐在宗设上座，其货船虽然后至，但先于宗设货船受检。宗设怒杀瑞佐，焚其船只，追宋素卿至绍兴城下，沿途劫掠而去，明备倭都指挥刘锦、千户张镗战死，浙中大震，史称“争贡之役”。事后，给事中夏言奏倭祸起于市舶，乃裁闽、浙两市舶司，唯存广东一处。（清）谷应泰：《明史纪事本末》，吉林出版集团2005年版，卷五十五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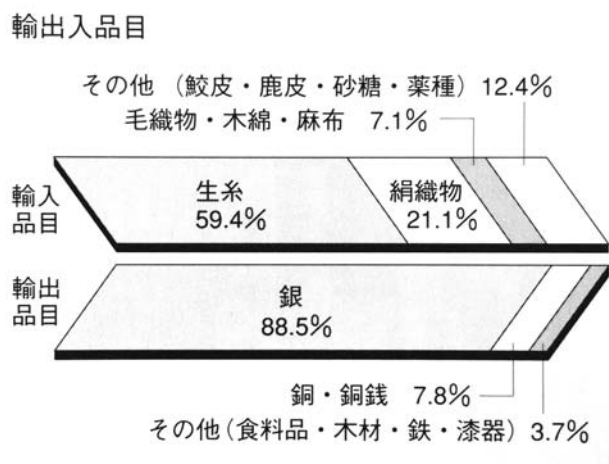


图6 明日贸易商品输入输出状况（《日本历史馆》，小学馆1995年版，665页）

不可过生丝也。”徐光启说：“彼中百货，取资于我，最多者无若丝。”^①“若番舶不通，则无丝可织，每百斤值银五十两，取去者其价十倍。”与徐光启《海防迂说》所提供的资料几乎完全一致，湖丝运往日本“取去者其价十倍”，可见生丝是利润最高的商品。如此重大的获利渠道，一旦遭到禁堵，后果是不堪设想的。

丝印名称正是由生丝贸易而来。如上所述，丝印这一名词来源于横井时冬的《丝印之考》，随生丝而来，以为合同之证。另有山中实《丝印名称考》略为翔实：“彼邦输入生丝每斤必添附铸印一个，包纸钤印影，印装入丝包内，开包时印影与印章对照一致，以为合同契约之证，因此称之为丝印。”^②

此外，荻野三七彦《国史大辞典》对丝印的解释是：“从十五世纪中国的明代输入我国的生丝，是每一斤生丝添丝印一个。在货物检验时核定斤两，检查完成后再捺上原印影返送回发货处以为收货凭据。印章本身则不返送，于是留在收货人手中，长此下来，丝印的数量也就多了起来。”^③

以上之说，可以说是有关丝印的权威性定论，那么有必要确认一下上述交易行为是官方还是私商。

永乐二年（1404）规定日船“其十年一贡，船限两艘，人限二百，违例则以寇论”。如果是十年一贡，合同、受领书之类相隔十年再返送之说几乎没有可能。再者，官方的朝贡贸易都是一次性购买，不会出现货到验收、日后付款的复杂方式。故而上述之行为则非是官家贸易，乃私商之间的交易手段。由此可以推断，丝印的另一部分功能是明日海上私商“勘合”生丝之用。

至于一斤丝添丝印一颗之说，似乎也不合理。参照《长崎荷兰商馆日记》：“郑氏海商运去的丝及纺织品更多，仅一六四一年六、七两个月，郑芝龙运往日本长崎的货物中有生白丝

①（明）徐光启：《徐文定公集》，《明经世文编》卷491，中华书局1962年版。

② [日]山中实：《丝印名称考》，《共古日录抄》，青裳堂书店1981年版，第209页。

③ [日]荻野三七彦：《国史大辞典》第一卷，丝印项，吉川弘文馆1979年版。

二万五千七百斤，各种纺织品十四万零七百六十匹。”^①如果按一斤丝配一印的话，仅郑氏两月之量就将有二万五千七百颗之多，生丝贸易持续百年之久，丝印数量将何等泛滥。

另有竹越与三郎在《日本经济史》第五卷中说：“白丝一丸为五十斤，一斤为百六十两，中国及葡萄牙商人每丸封之，并添付铜印一个，日本商人收货后将铜印押捺收领证明之上，中国及葡萄牙商人领取此证明，以备日后金银支付。”^②五十斤为一丸，如果是竹越与三郎所说的一丸（包）配一印的话，其数量尚有可能。

至此，我们可以看到，明日海上贸易中，无论官家或私商，印章一直作为一种勘验、勘证的手段而存在。于官家是用于贡船勘合符中的“勘合印”，于私商则是验证生丝的“丝印”。伴随着贸易活动的增大，在功能上、样式上逐渐增多，产生了内容丰富的印章群，后人将这一系列统称为丝印。

二、丝印与生丝贸易

生丝上为何要添附印章？丝印的不可取代性又是什么？

1. 验货之用

据《嘉靖实录》等史料记载：嘉靖二十六年（1547）夏天，浙江余姚发生惊动嘉靖帝的“谢氏血案”，“谢氏与番客（海商）交易，度负多不能偿，诸奸即恨且惧，乃纠合徒党番客，夜劫谢氏，火其居，杀男女数人，大掠而去。”^③从这起欠债纠纷中可以看到，海商在交易过程中不一定是想象中的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方式，发货方与收货方相隔千里，通信联络困难，许多海商可能只是担任运送任务，为防止中间失误，收发都要有细致的勘验手续，其中就包括前文竹越与三郎所言的那样：“从日本商人（长崎商人）手中取得钤有铜印的受领证，以备日后支付金银之用。”

2. 商品标志

木宫泰彦在《中日文化交流史》中记述：“如万历三十七年（1609）唐船主陈振宇、陈德运到日本场津澳的货物有缎、青绉、光素、素绉、丝绉、绉帽料、素绉、蓝绉，合计六百零三匹，此外还有大量的天鹅绒、胡丝、毛毡、扣线等纺织品。”^④可见中国丝绸织品对日本出口量是相当大的。如此繁多的种类，必然给管理上带来困难。

另外，竹越与三郎的记述中有一个重要的环节不容忽视：“中国及葡萄牙商人在每一丸白丝中置铜印一个。”即中、日海商之外，还有第三国的葡萄牙商人使用丝印。

1513年葡萄牙商船首航中国，至1638年形成以澳门—长崎—中国为轴心的葡萄牙日本贸易网。葡萄牙史学家儒塞斯（C. A. Montalto de Jesus）在《历史上的澳门》一书中是这样描写的：“欧洲与东洋的贸易，全归我国独占。船从果阿航行至科钦得到香料和宝石，又从科钦、马六甲得到香料，其次再把这些物品在澳门换取绢丝货加入船货，最后又把以上的货物运到日本换成金银

① 日兰学会编《长崎荷兰商馆日记》第一辑，雄松堂1989年版，第536页。

② [日]竹越与三郎：《日本经济史》第五卷，平凡社1943年版。

③ 赵志军：《明清之际的海禁政策与海商》，《法治与社会》2009年第8期。

④ [日]木宫泰彦：《中日文化交流史》，大修馆书店1995年版，第148页。



图7 “湖州真石家念二叔照子”印



图8 “湖州真”印



图9 “湖州真石家念二叔照子”
镜铭

块。……”^①由此构成印度洋、大西洋、中国海一个一定规模的贸易循环。对于不谙汉字的外国商人来说，系在生丝上各种样式的铜印可以说是分辨商品的最好商标。另外，铜质印不易损坏，不易复制，保存性好，可以反复钤捺，这也是其他物品所不可以取代的重要性之一。

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背景就是生丝产地与丝印的关系。生丝尤以太湖近旁湖州所生产的湖丝最为畅销，“湖之丝绵，漳之纱绢，松之棉布，尤为彼国所重。”^②湖州又盛产铜，有名的铜制品“湖州镜”当时也出口日本，故而在日本人的印象中，“湖丝”与“湖州镜”是湖州的代表商品。丝印中有“湖州真石家念二叔照子”印（图7）、“湖州真”印（图8），与同文字的湖州镜镜铭（图9）相对照，“连尺寸也符合不误”^③，甚至可以说是湖州镜铭转铸制而成的。明中期以降，随着倭寇、葡萄牙商船的加入，生丝的贩卖日渐激烈，质量良莠不齐，一部分中国商人为证明货物是真正的“湖丝”无误，而特别制作湖州产的铜印置入包中为证。比如“湖州真”的印文（图7参考），想必是强调产地的目的。

关于这一点，陈振濂先生在《铜镜研究中的又一个罕见的范例：“照子”镜与印说》中指出：“据考证，这个‘丝印’是当时湖州丝绸商贸易输出，海运至日本的大批量丝绸货包装运时的凭据。湖州丝商们雇专人铸造‘丝印’，以铜印形式表明商标与产地、厂家，童叟无欺，货真价实，信用与品牌皆在其中。”^④

广濂裕之在《印的历史与看法》中认为：“丝印是配在生丝订货样品上的标志”，“生丝订货时捺印即可”，“一种产地的证明，种类的表现。”^⑤笔者认为，陈振濂先生与广濂氏的论述简洁明了，解开了许多疑惑。

① 儒塞斯：《历史上的澳门》，澳门基金会2004年版，第40页。

② 姚士麟：《见只篇》初编本，卷上。

③ [日]新关钦哉：《丝印之谜解》，《富冈美术馆开馆十五年纪念展》1993年，第7页。

④ 陈振濂：《铜镜研究中的又一个罕见的范例：“照子”镜与印说》，《杭州日报》2016年3月3日。

⑤ [日]《书道》杂志1988年第15辑，第39页。

三、丝印的造型特点

有一句古语叫作“一图胜千言”，还有一个理论叫作“图优效应”（Picture superiority effect），它的意思是图片是比文字载体更易被记忆的，同样内容用图片传达的信息是文字的六倍，因此它使得人脑更易于编码和记忆。

丝印无论是勘合还是标志，其目的都是防伪、易识，在方寸之地如何制造这种矛盾的存在，笔者以为丝印易识的印钮与难辨的印文恰好组成了这个关系。丰富多样的印钮（二百数十种以上）与印面（三百五十种之多）^①相互组合，形成七千多种不同的标志。为了防止伪造，大部分印面采取了隐讳难识的处理方式，非个中之人不解其秘。而恰恰因为这种“异化”的处理方式，产生了别为一体的印章意趣。

丝印与其说是印，还不如说是一种图形符号，许多的造型突破了印章的传统分野，向我们展示一部更具包容性、更多元、更奇特的装饰性图像，给人以一新的视觉感受。目前为止，对于丝印的研究，其艺术价值的部分尚未见论及，笔者试以分类分析的方式，探寻其中的造型特点。

（一）印文分类

1. 姓氏类：郑氏、赵、卢、张、言、林、莫（图10）、伏、丑、贺、祝、荣（图11）。（贺、祝、荣或为吉佑类）
2. 道义类：同不害正共不伤物、忠（图12）、文行忠信（图13）、正心、长信、道信、道、



图10 莫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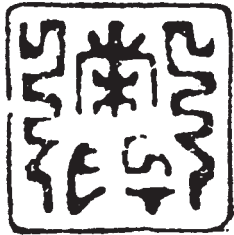


图11 荣



图12 忠



图13 文行忠信



图14 天吉



图15 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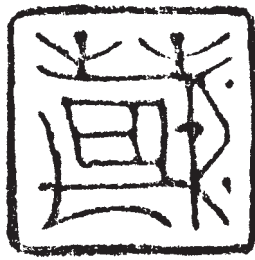


图16 藏



图17 驹引惠钱

^① [日]新关钦哉：《丝印之谜解》，第6页。



图18 仙人乘鹤



图19 鸢扑鱼



图20 兔鸟卍字形



图21 花形

夔、赞。

3. 吉佑类：永生嘉宝、天吉（图14）、我佛、政清、大吉、天佑、祐、胜、符、荣、泰、宝（图15）、星、丰、胜、爵。

4. 商用类：湖州真、湖州真石家念二叔照子、封信、调、持、定、未、读、巾、长、重、覆、履、藏（图16）。

5. 图案类：“驹引惠钱”（图17），此图形与战国时代足利将军家军用钱“驹引惠钱”图案相似，故付此名。其他有“仙人乘鹤”（图18）、“鸢扑鱼”（图19）、“兔鸟卍字形”（图20）、“花形”（图21）、“弹琵琶”^①，在方寸之间将人物、动物的特点表现得既抽象又传神。

以上部分是可辨识的文字及图案，而丝印中更大部分是不可辨识的文字，正如横井时冬所称：“或有一字可读而他不可识，或有似文而非文者，盖道家之咒文，浮屠之梵字，又蒙古字之类，不能复知也。”^②不可读的原因，一是故意将文字做变形处理；二是似文而非文的抽象性设计，造成复杂神秘的印面效果。

（二）印文的造型

1. 字体：以篆书为主。篆法无一定模式，大多不合六书，加之变形的处理，使其“非篆非隶要无知所其从来”，偶尔有楷书体“慎”、“深”等，“湖州真”、“湖州真石家念二叔照子”，皆取自湖州镜铭。（图7、图8参考），另有个别草书体字形出现。

2. 加笔加纹饰：此种手法在丝印印文中占多数。丝印印面设计大多是不留空间的宋元印形式，为了填补空间，不规则元素被穿插在整个画面中，在文字的周围添加笔画或纹饰以为装饰。添加笔画的粗细、曲直与文字笔画相随，自然凑合，造成文字与纹饰很难分清的效果。（图11、图12、图22、图23）

3. 减笔：少写、毁坏部分字画，造成残缺不整。（图24、图25）

汉印篆法中有增减之法，皆有所本，增减得宜，不拟字义，不失篆体。丝印中有不知六书之理随便增减，所谓差以毫厘，谬以千里，以达到扰乱对文字判断的目的。

4. 变形：个别笔画拉长或扭曲。（图26）

5. 反字：丝印中印文反字处理也很多，有学者认为是忽视印章钤捺功能，仅作为标识而使

① [日]山中实：《丝印名称考》，第211页。

② [日]横井时冬：《丝印之考》，第337页。



图22 上：胜字原印，
下：加笔部分消去后效果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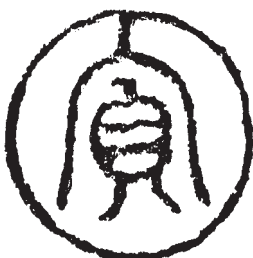


图24 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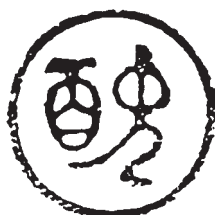


图25 丑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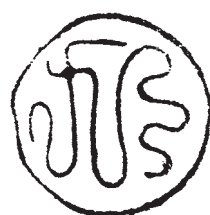


图26 九



图23 因加笔而无法
辨识的印文两例



图27 印文反字处理两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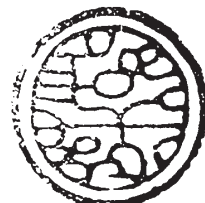


图28 装饰性造型四例

用。但“政清”印中两字一正一反，“政”字左右偏旁亦做正反写法，故有故意为之感，亦可以推测为防止伪造的一种方式。（图27）

6. 装饰性图案：几乎找不到文字性的信息，图案化明显。（图28）

（三）印面的造型

1. 印形：常见的方形、圆形以外，六角形、八角形、菱形、分铜（砝码）形、葫芦形、木瓜形等不规则的图形，个别形状不宗古法，显得富有个性。（图29）

2. 点的运用：点是点缀、丰富画面气氛的元素，当它与周围要素进行协调时，可以看到其在增加画面的丰富性，以及平衡视觉方面起到的作用。（图30、图31）

3. 线的运用：许多线条游离于点和图形之间，长、短、弯曲、斜，同方向的线条和不同的排列方式也对视觉起了不同的引导作用。印面中曲线的运用，贯穿整个印面，具有温柔、轻松、饱满

的感觉，打破了乏味的文字整齐排列范式。（图32—34）

（四）印钮

丝印的印钮丰富多彩，朴素可爱。笔者以为，如此繁多的种类，不仅仅是装饰，而是代表着某种标志。与印文相比，印钮通俗易懂，以易识的印钮与难辨的印文相互搭配，在交易活动中担当着不同的角色。比如说印钮的形象代表某一商家，印文的图案代表某一种商品，这其中的细节，有待今后做进一步的考证。

印钮造型主要以动物为主，狮子、犬、牛、羊、猿、象、龙、蛇、蜥蜴、鼠、龟、蛙、鸡、鸭、兔、鱼、蟠螭等。在传统的印钮造型以外，也有自成特色的，如人物有坐式、骑马、人面等，还有城门、帽子、匾额、釜、钟、铃、果实等生活中物件。另有惠比须、大黑等日式传说中的神话人物，由此可以看出日方对丝印功能的认可，在制作中加入了一些日本的民俗特征。（图35）



图29 丝印的各种印面造型七例



图30 赵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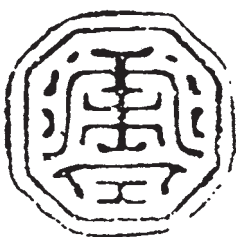


图31 卢



图32



图33



图34



图35 糸印印钮造型“城门”“牛”

丝印不具款识，可能是一般印章雕刻工匠所制，或者说是按客户要求所制，风格上不受古法的约束，工艺性特点明显，在造型上既有南北朝时期的图像印，也可以看到宋代官印中屈曲填满、笔画牵连交织的叠篆写法，又借鉴元代花押印的隐晦手法，会古人之意，有自然之妙，其中的奇趣野趣也非正字之所有，有着一种不可名状的奇异之美。中井敬所（1831—1901）赞其“皆有古色苍然可掬，若以宋元之古气较之，更无优劣矣”^①，来推崇它高古奇崛的形象。

四、丝印在日本的影响

（一）政界

丝印与日本江户时期政界有着隐晦莫测的关联。有关丝印的研究几乎都会提到丰臣秀吉、德川家康爱用印（图36、图37）^②即来自丝印，又有织田信长下赐给大藏流狂言家丝印用于钤发（演出）执照。其实早在室町时代，幕府为解决国内财源枯竭的问题，将军足利义满急于寻求建立与明朝的朝贡贸易关系。在商人的劝说下，派遣商人及亲信携带国书入明进朝贡，将入明朝贡看作是一种营利之机，甚至成为国家重要的财政收入来源。如日本学者臼井信义在《足利义满》一书中写道：“义满鼎盛期的北山时代最重要的财政收入来源，实际就是和明王朝的贸易。”包括后来的生丝走私贸易中，历代幕府将军丰臣秀吉、德川家康等都是暗中给予支持，以此抽取营利。因此对于幕府权力者来说，丝印或许是一种不宜公开的强大的利益的标志。江户幕府上层人物在签名时流行以花押来签名，一是防止伪造，亦可以显示其高深莫测的一面，而丝印本身神秘的形象又加深了这层因素，故而受到政界的喜爱。

（二）篆刻界

江户时期中期的篆刻家高芙蓉喜好收藏丝印，他评价丝印“瑰奇雅逸掬古意”，但在他的作品中未能看到受丝印影响的部分。近代篆刻家河井荃庐在《日本古印新考》中称：“丝印之物中国未见，首先中国古印中不作不规范文字之印，所谓不作藩风之物也，此亦非日本之物，恐似安南（越南）玩具之一种输出他国乎。”或许是因为受河井荃庐的影响，丝印在日本篆刻界没有受到正面的评价。

（三）画界

虽然在篆刻界未得到认同，但丝印在绘画界得到特别的青睐。狩野探幽、川崎千虎、尾崎红叶、桥本雅邦、梁川星岩、菅井梅关、椿椿山、高久靄厓、谷文晁、寺崎广业、富冈铁斋、吉川灵华、川端龙子等画作都能看到丝印的影子。这些画家都是传统的所谓“文人画家”，使用丝印的原因，笔者推测一是出于对中国文化的景仰，二是日本绘画中本身就有一种暧昧的因素，古、雅、苍、涩的气息又与丝印相符，所以画作中钤丝印，会增加上述特色。（图38）另外，模仿丝印风格

① [日]横井时冬：《丝印之考》，第338页。

② 取自日本印章历史馆所藏丰臣秀吉、德川家康墨迹。



图36 丰臣秀吉墨迹中所用糸印



图37 德川家康墨迹中所用丝印



图38 日本画家作品中所用丝印（节选）



图39 借鉴糸印风格的印章



图40 栖风
富冈铁斋刻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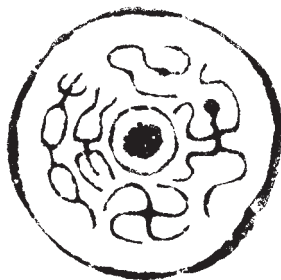


图41 子孙千万
富冈铁斋刻



图42 今日流水前身明月
富冈铁斋刻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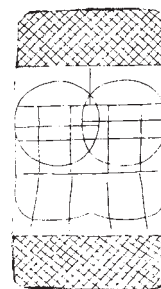


图43 无门
香川峰云刻

制印也可以看到，大阪商号“纳屋”之印巧妙地运用了丝印中文字与图案结合的方法，将平假名的“なや”隐藏在看似复杂的印面中。山田道安、高桥泥洲、僧良富等画家自用印中也能够看到模仿丝印风格而成。（图39）

在继承方面，特别要提到的是富冈铁斋，他在作品中不仅使用丝印，并且在治印中借鉴丝印的表现风格，可以说是将丝印运用到篆刻的第一人。（图40、图41、图42）现代篆刻家香川峰云的作品“无门”也借鉴了丝印中文字重叠、图案装饰等手法，使作品具有极强的装饰风格。（图43）

尾 语

随着生丝贸易的终止，丝印也退出了历史的舞台，存于民间的丝印后来又因“其字不可读，尚之者鲜，故其价廉，故销以铸他物”^①而逐渐衰废。据记载，在日本宝历、明和时代（1751—1771）的废铜运动中多数丝印被化铸为他物^②，故存世数量不断减少，近年由于研究的推进而又得到重视，嗜古之士，多收藏辑谱，进而人争宝之，已是一印难求。

在篆刻史中处于偏流、孤立存在的丝印，在提倡艺术多元化的今天看来，其中蕴藏着别为一体、标新立异的信息，古质而今妍，若取之有度，用之有道，对于我们探索篆刻艺术表现有着值得借鉴的地方。

（作者系日本爱知学院大学副教授）

① [日]山中实：《丝印名称考》，第210页。

② [日]山中实：《丝印名称考》，第211页。